

《世說新語》劉辰翁評點研究 ——中國小說評點之祖的商榷

丁豫龍*

摘 要

元刻本《世說》八卷希罕而珍貴，世上僅存兩部，文物及版本上的價值固然很高，其中劉辰翁的批語也具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元刻本另有劉應登的批注，但長久受到輕忽，而劉辰翁的批語，明、清人褒貶不一，今人則頗多肯定，甚至推許為中國小說評點的始祖，具有開創典範的歷史意義與地位。然而，明代以來的學者大多未能目睹此書，僅從傳抄的少數批語立論，造成一些認知上的偏差。從而在論斷劉辰翁評點的歷史定位之前，必須針對元刻本的真偽、年代與批注情形，確實的考辨清楚，進而對於批語的內涵，也須全面而切實地探討。本文以為此書刊刻於元代無誤，劉氏兩人的批注也真實不偽。劉應登的批注雖然早於劉辰翁，但仍屬於傳統的章句注疏，不能視為小說評點。劉辰翁的批語則是把他評點詩文一貫的審美取向移植到《世說》，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賞析，而與宋元「說話」伎藝無關，更超脫了史傳實錄的框架，能夠肯定虛構、想像的價值，確實是中國小說評點的先導。

關鍵詞：劉辰翁、劉應登、世說新語、評點、小說

*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助理教授。

Textual Research on Liou Chen-weng's Commentary of *Shi Shuo Xin Yu*: Identification of the Founder of the Commentary on Chinese Novels

Ting Yu-L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uneral Science,
Jen-Teh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Abstract

The thesis discussed the value of Liu Chen-weng's commentary on *Shi Shuo Xin Yu* as well as the style, objects, views, and contents of it. Liu's commentary possessed both rational and perceptual manners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Liu's commentary affected style, objects, views, and use of language in commentary upon Chinese novels. That commentary on *Shi Shuo Xin Yu*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y of Chinese novels. In addition, Liu's commenta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ng commentary on Chinese novels and laid groundwork for it. Liu Chen-weng was the first one to do commentary on *Shi Shuo Xin Yu*. Liu's commentary not only improved notions of reading *Shi Shuo Xin Yu*, but also helped later generations do such research on Chinese novels. Therefore, He was regard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commentary on Chinese novels.

Keywords: Liou Chen-weng, Liou Ying-deng, *Shi Shuo Xin Yu*, the Commentary on Chinese Novels, Chinese Novel

《世說新語》劉辰翁評點研究 ——中國小說評點之祖的商榷

丁豫龍

一、前言

生活於宋末元初的劉辰翁，善詩詞而能文，並且熱衷評點，範圍涵蓋了道家典籍、史傳與唐宋著名詩人作品。歷來以他的詩歌評點較受矚目，研究的人較多，也較受到肯定。但民國以來，小說的研究日益興盛，從作者生平、版本的考據漸及於美學，明清白話小說評點因此備受關注。學者在讚嘆李贄（1527-1602）、葉晝（？-1625）、金聖嘆（1608-1661）、毛宗崗（1632-1709）、張竹坡（1670-1698）等傑出評點家之餘，追源溯本，尋幽訪勝至劉辰翁的《世說》評點，並且譽為中國小說評點之祖。然而，自明代以來，無論是研究小說或者專門研究《世說》的學者，多未能親見此一元刻本的實際面貌，諸種立論未必確切而公允，而必須重新檢視。

元刻本《世說》八卷，當今世上僅存兩部，一部典藏於臺北的國家圖書館，另一部收藏在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¹，從而使得此書更形重要。明人凌濛初即言：

嗣後家弟初成（凌濛初），得馮開之先生所秘辰翁、應登兩家批注本，刻之為《鼓吹》。欣然曰：向年蠹簡殘編，已成煨燼，今獲捃摭其全，良為快事。

¹ 北京大學中文系潘建國教授詳細比勘過這兩部書，判斷「均為元刻元印本，且屬同版，惟刷印時間有先後，內閣本的印刷質量略優。」參見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係元代坊肆偽托〉，《文學遺產》6（2009），頁 66。本人之研究則是以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元刻本為主，另外輔以臺北館內所藏之另一元坊肆仿刻本，至於日本東京內閣本《世說》，本人未及得見，但不構成妨礙。

行之已久，獨失載圈點，未免有遺珠之嘆。²

凌濛初（1580-1644）兄弟在明代已經極不容易見到劉氏兩人的批點了，而今人所見者即主要來自於凌氏兄弟所轉錄，曾校箋《世說》的徐震堦便稱：

引用諸家之說，皆注明出處，其中劉應登、劉辰翁、王世懋的評語，見於凌（瀛初）刻本。³

頗受學界肯定的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一書，雖然以廣搜版本自詡，也未能見到此書：

元刊劉辰翁批點本《世說新語》八卷，現已無存，唯日本尚有殘本。因而元刊劉氏批點本不得見其原貌，唯有明凌瀛初等所刊評點本將其評點保存了下來。⁴

新近的研究成果，朱鑄禹《世說新語彙校集注》之中的批語也同樣是轉抄來：

劉應登至元二十四年刻本已佚。明代凌濛初鼓吹本中所存的劉應登眉批較各本為多，故此凌濛初鼓吹本最接近劉本。⁵

劉氏兩人的批語乃屬於雙行小字的旁批或夾注，置於頁內文句之後，而不是書頁上方的眉批。學者們只依據明清人的轉錄來立論，因此有了基本認識上的錯誤。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也有相同的謬誤：

劉辰翁對《世說新語》的評點，幾乎都是以眉批的形式出現。凡他有體會處，便在眉端批上幾句，有時甚至只有兩三字、三四字，多者也不過二三十字。⁶

對於劉辰翁《世說》批語的研究，明清兩代往往只依據傳抄過錄而成的評本來論斷，未能從元刻本的實際樣貌來分析，甚至只針對其中的十餘則批語反覆申說，所得到的結論很可能以偏概全，甚至作出了「過度的詮釋」。其中最重要的主張，莫過於「中

² 明·凌瀛初四色套印本《世說新語·跋》，參見劉強：《世說新語會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附錄，頁 531。

³ 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8。

⁴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70。

⁵ 朱鑄禹：《世說新語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附錄，頁 17。

⁶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頁 65。

國小說評點之祖」一說，今人無論是否認同，都有必要確切檢視此一元刻本《世說新語》。

二、「中國小說評點之祖」認定的問題

民國以來，對於劉辰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詩歌評點與詩詞創作⁷，他的《班馬異同》、《世說》等文史方面的評點鮮少有人關注。今人對於劉辰翁《世說》評點的推崇，最早大約可以追溯至 1981 年王運熙、顧易生等多人合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冊。該書認為劉辰翁難能可貴的注意到小說的語言、人物、動作與性格等之間的聯繫，明確的主張劉辰翁《世說》評點「開了明清兩代大量的小說評點的先風。」⁸此一說法提出之後，即有不少人附和，甚為學界所認同。劉辰翁「為中國小說評點的第一人」⁹，今日似乎已成定論¹⁰，但是王運熙等人對於所據以論斷的一項重要資

⁷ 20 世紀 30、40 年代刊行的郭紹虞、羅根澤等早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只提到劉辰翁的詩文見解，而不及於《世說新語》評點。

⁸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214。此書自 20 世紀 60 年代初期便開始由劉大杰主編，復旦大學多位教授集體編寫，1964 年上冊問世，1981 年中冊印行，迄今仍陸續有新的修訂版。甚至曾擴大為七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從 1989 年開始分卷印行，其中所提出的有關劉辰翁《世說》評點的意見，主導了學界的看法甚大。

⁹ 孫琴安：〈劉辰翁的文學評點及其地位〉，《天府新論》6（1997），頁 18。

¹⁰ 譚帆對於此一問題的看法，前後有所不同。早年發表論文〈小說評點的萌興〉，《文藝理論研究》6（1996），明確認為「萬曆時期是中國小說評點的源頭」，「萬曆年間小說評點的最早作品是刊於萬曆 19 年（1591）的萬卷樓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但之後寫成專書《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態度趨於模糊。一方面承認劉辰翁的《世說新語》評點是「小說評點之肇始」，另一方面卻又說「小說評點……萌興於明萬曆年間」、「綜觀古代小說評點的發展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明萬曆年間，這是小說評點的萌生階段。」「就現有資料而言，萬曆年間小說評點的最早作品是刊於萬曆 19 年（1591）的萬卷樓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參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頁 14-15。其他知名的學者，大致有陳謙豫：《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20。劉良明：《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頁 72。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頁 35。寧宗一：《中國小說學通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頁 840。康來新：《發跡變態：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頁 182-185。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頁 67。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

料顯然並未經過仔細檢驗，他們認為：

明許自昌在《樗齋漫錄》中提到當時最負聲名的李卓吾評點《水滸》時，指出劉辰翁就是李的先行者，可見劉辰翁在明代小說評點派心目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¹¹

明人許自昌（1577-1623）一人的看法，已不免是一種偏見。何況，事實上許自昌在論述李贄的小說評點時¹²，並沒有表示劉辰翁的《世說》評點引發了李贄批點《水滸傳》。《樗齋漫錄》卷6稱：

頃聞有李卓吾名贄者，從事竺乾之教，一切綺語，掃而空之，將謂作《水滸傳》者必墮地獄當犁舌之報，屏斥不觀久矣。乃憤世疾時，亦好此書，章為之批，句為之點，如須溪滄溪何歟？¹³

其中「須溪」指的是劉辰翁，但「滄溪」則不知何所指？疑是字誤，應當是「滄浪」。¹⁴屬於斟讎學上所謂的「涉上下文而誤」，「浪」字蓋涉上「溪」字而誤。¹⁵許自昌提及評點而同時舉出劉辰翁與嚴滄浪（1192-1246）為參照，嚴滄浪的《滄浪詩話》評賞了唐人的詩歌，這裡提及劉辰翁，應當也是指劉辰翁所評點的一些詩集，而不是

家》，《國文學誌》3（1999.6），頁240。陳美林：〈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簡論〉，《陰山學刊》13：1（2000.3），頁24。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83。王汝梅、張羽：《中國小說理論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頁36。韓進廉：《中國小說美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頁88、99。

¹¹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冊，頁216。

¹² 根據今人郭英德所作的考證，我們對於許自昌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許自昌，字玄祐，別署梅花主人……長洲人，約生於明萬曆五年（1577），至明天啟元年（1621）尚在世……屢試不第，遂謁選，授文華殿中書。後請假歸里，葺圃娛樂，詩酒留連……生平以讀異書、交異人為快，校刻《太平廣記》一書，著稱於世。而盛唐名家集行世者，多出其校讎……年四十六。著有《樗齋詩草》、《樗齋漫錄》、《捧腹編》等。所撰傳奇七種：《水滸記》、《橘浦記》、《靈犀佩》三種，今存。」參氏著：《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362。

¹³ 明·許自昌：《樗齋漫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65》（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6，頁304。

¹⁴ 劉須溪、嚴滄浪並舉，也見於清人錢曾的《讀書敏求記》：「說詩至嚴滄浪而詩亡，論文至劉須溪而文喪。」參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雜家類，頁273。

¹⁵ 王叔岷：《斟讎學》（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頁142。

針對《世說》而言。¹⁶因為劉辰翁評點之名聲，主要建立在他的一些為數眾多的唐宋詩歌的評點，而其《世說》批語相較之下簡略許多，流傳不廣。此外，許自昌在文中只是大表奇怪，詫異於李贄先前頗為厭惡《水滸傳》，如今一反初衷，為何如同劉辰翁、嚴滄浪那樣的詳加細讀、批點作品文本？其中絲毫沒有主張劉辰翁是小說評點之祖。

況且，《樗齋漫錄》一書實為明人葉晝所偽托，早經明人錢希言指出¹⁷，並且得到王利器等學者的考證確定。上述所謂許自昌對於李贄評點的描述，「此則葉晝之自道也」¹⁸，其目的在於炫售他所假冒李贄名義的《水滸傳》評點。¹⁹如果此說屬實，也就更不能據以推斷李贄的小說評點是受到劉辰翁的影響了。

其後一些研究文學批評、小說的學者們在倡言「劉辰翁為小說評點的開山祖」²⁰此一論點時，也多引用《樗齋漫錄》作為一項重要依據，但由於此書不易得見，從而對於內容沒有仔細查檢，只是先後蹈襲此一說法。陳美林即稱：

對小說的評點，最早出現在宋季，明人許自昌認為小說評點始於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²¹

此外，不少學者更特別強調劉辰翁評點與小說之間的關係。王能憲便聲稱：

須溪批點《世說》的最大特色，在於他是以小說的眼光來評點《世說》的，注重作品的藝術性；這與劉孝標以史家的眼光為《世說》作注，是大相逕庭而大異其趣的。須溪在批語中明確地把《世說》目為小說。²²

王能憲文中所謂的「小說」，其義涵並沒有明確的說明。但從其文意可以推知，他所謂的「小說」，指的是「子部小說」，因為依照傳統的圖書分類，宋元時代《世說》

¹⁶ 縱然許自昌之言，包含了《世說》批語在內，但並無任何推崇之意。

¹⁷ 明·錢希言：《戲瑕》，收入《筆記小說大觀》17編（臺北：新興書局，1978），卷3「贗籍」條，頁1058。

¹⁸ 王利器：〈忠義水滸傳郭勛刻本和李卓吾評真本之發現〉，《王利器論學雜著》（臺北：貫雅文化公司，1992），頁627。

¹⁹ 葉朗：〈葉晝水滸傳評點考證〉，《中國小說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87），頁368-369。

²⁰ 寧宗一：〈小說評點與小說藝術〉，《尋根》4（2001），頁41。

²¹ 陳美林：〈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簡論〉，頁23。

²²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頁99-100。

被視為子部小說。

顧易生、蔣凡等人也認同劉辰翁是以小說的眼光來評點《世說》，但是他們所稱的「小說」，卻是指「話本小說」。他們在論述劉辰翁的《世說》評點之前，先探討了小說評點的起源，而指向了「說話」伎藝：

小說評點的出現……它與唐宋以後都市經濟日趨繁榮有關，與當時新興市民階層意識及其審美要求相適應……受到說書人評說啟迪，後來小說評點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評點來起到導讀作用。²³

然而，「小說」一詞，中國歷代的涵義不一，內容龐雜，更不同於今人的概念。「子部小說」並不包括「話本」在內，並且也與「說話」伎藝、「說書人」無關，不可一概而論，必須細加分辨。但顧易生等人不僅認為劉辰翁是以說書人的眼光評點《世說》，並且涵蓋了詩歌、古文、史傳等文類在內，而且這是源自於「唐宋以來『說話』的影響」：

（劉辰翁）以小說家的眼光，運用小說筆法來評點詩文史傳，更可見他對小說及其理論批評的熱情……劉辰翁某些詩文創作及其批評頗富小說味……辰翁評詩文、批《史》、《漢》如讀小說……《世說新語》評，是我國第一部小說評點著作，它奠定了劉氏作為我國古代小說評點派開山宗師的崇高歷史地位。²⁴

康來新、楊玉成等學者相繼也有類似的看法，更進而強調市民文化的影響，把劉辰翁評點的方式歸因於「說話人」講述故事之際的「說話」策略，並以此來詮釋劉辰翁閱讀唐宋詩歌與敘事文類的眼光：

評點細讀……其成因歸於時代產物，更為中肯。如同宋人詩學之「詩話」與民間說話之「詩話」相關，劉辰翁的《世說》評點亦與市井小說風靡大眾的趨勢相一致……小說讀物的評點毋寧是說話行為的模擬，主控了閱讀行為，發揮了最重要的導讀作用。²⁵

²³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725-726。

²⁴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下冊，頁 729-734。

²⁵ 康來新：《發跡變態：宋人小說學論稿》，頁 182-183。

劉辰翁評點貫穿一種小說的眼光，留有閱讀或（聆聽）話本小說經驗的痕跡，小說影響了文學閱讀……特別是敘事文類《莊子》、《史記》、《世說新語》三部評點，這種傾向尤其顯著，小說甚至改變了評點的思維和批評方式……整體而論，市民文化塑造了一種獨特的閱讀視角，促使劉辰翁以一種小說的眼光閱讀，既閱讀詩歌，也閱讀敘事文類。²⁶

學者們追根究柢，從小說、說話、說話人、話本而至於市民文化。不僅強化了劉辰翁《世說》評點是中國小說評點之祖的歷史地位，更把其中的原因歸諸於「說話」、話本與宋代城市繁盛之下所興起的市民文化。

新近，又有一種論點反其道而行。北京大學潘建國教授舉出了幾點理由，否定劉辰翁評點過《世說》，以為元刻本上的劉辰翁評點乃是元代坊肆所偽托，目的在於商業行銷。

劉辰翁批點文字乃屬坊肆「炫售」竄增，非劉應登初刊時所刻。²⁷

如果此一論點能夠成立，則不僅劉辰翁未曾評點過《世說》，其「古代小說評點派開山宗師的歷史崇高地位」，也要遭到抹滅。

綜合起來，學者們這一連串的推論能否成立，牽涉到下列幾個問題，而有待進一步討論和釐清：

- 1、劉應登、劉辰翁兩人評點的先後順序？
- 2、劉應登、劉辰翁兩人評點的性質如何？屬於章句注疏或者文學評點？
- 3、《世說新語》一書應當如何看待？小說或者史傳？
- 4、元刻本《世說新語》的真偽？
- 5、《班馬異同評》是否為劉辰翁所作？其中批語的性質又如何？
- 6、劉辰翁的評點《世說新語》是否受到「說話」伎藝、市民文化的影響？

²⁶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頁 199-248。

²⁷ 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係元代坊肆偽托〉，頁 67。此一說法，作者明言乃是附和葉昌熾的看法。本文將在下文予以討論。

三、劉辰翁與劉應登

(一)、劉辰翁的生平與著述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宋史》無傳，其生、卒年各家說法不一，今人焦印亭等人的考證應可採信。根據劉辰翁的作品及其自注，可以推斷劉辰翁生於南宋理宗紹定5年壬辰（1232）。再依據劉辰翁之子劉將孫（1257-？）、好友王夢應等人所作的相關序跋、墓志銘、祭文等文獻，劉辰翁應卒於元成宗大德元年丁酉（1297），享年66歲。一生可分成兩個階段，計生活於南宋46年，元代20年。²⁸

至於劉辰翁的生平事跡，《四庫全書總目》之《須溪集》提要稱：

辰翁字會孟，廬陵人。須溪其所居地名也。少補太學生，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遂不復出。辰翁當賈似道當國，對策極言「濟邸無後可憫，忠良殘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幾為似道所中，以是得鯁直名，文章亦見重於世。²⁹

廬陵（今吉安市，位於江西省中部）一地，唐代稱為吉州，宋代又復稱廬陵郡，元代改稱吉安路。《廬陵縣志》對於劉辰翁的生平有較為詳盡的介紹³⁰，從當中的記載可知劉辰翁為人伉直、憂心國事，詩文受人推重，曾為太學生、進士、書院山長、府學教授、太常博士，也曾任職於中書省。往來之人多為碩學鴻儒，世所推重的文士，包括歐陽守道、文天祥、趙文、江萬里等。晚年61歲時，在雙溪書院講學，「不事科舉而專議理學」，「不趨城闕而干山林」，無意於仕宦而過著歸隱的生活。

他的著述頗為豐富，其子劉將孫編為《須溪先生集》100卷，《宋史·藝文志》有著錄，但已散軼。除了評點多種典籍之外，主要為詩、詞創作，但明代已難得見，現存者有《須溪集》10卷、《須溪四景詩》4卷、《須溪先生記鈔》8卷、《須溪先生

²⁸ 詳盡的考證，可參見焦印亭：《劉辰翁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11-15。

²⁹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165，集部18，別集類18，《須溪集》提要，頁3434-3435。

³⁰ 清·陳汝禎等修，匡汝諧等纂：《廬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31，頁2183-2184。

集略》3卷等，前兩種收錄於《四庫全書》。《四庫總目提要》有所評論：

然辰翁論詩評文，往任意取尖新，太傷佻巧，其所批點如杜甫集、《世說新語》及《班馬異同》諸書，今尚有傳本，大率破碎纖仄，無裨來學。即其所作詩文，亦專以奇怪磊落為宗，務在艱澀其詞，甚或至於不可句讀，尤不免軼於繩墨之外。特其蹊徑本自蒙莊，故惝恍迷離，亦閒有意趣，不盡墮牛鬼蛇神。且其於宗邦淪覆之後，睠懷麥秀，寄托遙深，忠愛之忱，往往形諸筆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體格繩之矣。《須溪集》明人見者甚罕，即諸書亦多不載其卷數……蓋其散失已久，世所傳者惟《須溪記鈔》及《須溪四景詩》二種，篇什寥寥。³¹

所作（四景詩）皆氣韻生動，無堆排塗飾之習，在程試詩中最高格。³²

清代四庫館臣對於劉辰翁的作品不甚推崇，以為內容大抵「艱澀」、「奇怪」、「惝恍迷離」，文意不甚可解，風格近似明末竟陵派的「幽深孤峭」，除了四景詩之外，只稱道其中所寄託的「國破傷懷之情」。至於他的多種評點，也評價不高，認為過於「佻巧」、「尖新」、「破碎纖仄」，無益於後人。

（二）、劉應登的生平與著述

劉應登字堯咨，號耘廬，生平資料更少，生、卒時間難以確定，《江西通志》卷146云：

劉應登字堯咨，安福人。景定間漕貢進士。宋社將危，隱居不仕。其為文出入經史，劉辰翁、趙文交推許之。所著有《耘廬集》、《詩經訓注》、《杜詩句解》行於世。³³

安福（今吉安市），唐代以來即隸屬廬陵（吉州），位於廬陵的西北方，劉應登與劉辰翁住居之地甚近。景定為南宋理宗的年號，一共只有5年，所以兩人同是景定3年（1262）進士，也同在宋末元初隱居避亂不仕，彼此頗有往來，應是同一時期、

³¹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5，集部18，別集類18，《須溪集》提要，頁3435。

³²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5，集部18，別集類18，《須溪四景詩集》提要，頁3435。

³³ 清·曾國藩等修：《江西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659冊，卷146，頁664。

鄉里之人。劉辰翁曾提到受劉應登所託，為其父撰寫墓誌銘一事：

達仲，樂邱翁也。余嘗記樂邱，知其賢且達，已記之。後三年而樂邱翁死，年七十，鄉人士惜之。是年翼甫又死，其中子應登將以丁亥某月日葬樂邱，謂曰：「應登與弟（翼甫）及門舊也，而弟已矣。」……樂邱，一號桂林，生嘉定丙子年十一月二十八，娶羅氏，三子應牛、應登、應鳳，登江西漕進士。翼甫，鳳也。³⁴

所謂「及門」，即是「受業弟子」。雖然此處記載兩人有師生情誼，但可能不是實質上的受教關係，只是一種謙稱。因為劉辰翁當時頗負文名，在鄉里中名望崇隆，所以劉應登向他請益求教是很可能的，這也是後來劉應登把自己新注的《世說》贈送給劉辰翁，而劉辰翁的評點意見也就顯得率直而無所顧忌。

根據此一〈樂丘處士墓志銘〉上的種種時間推算，劉應登之父劉達仲，生於南宋嘉定丙子 9 年（1216），享年 70 歲，則大約卒於元代至元丙戌 23 年（1286）。「是年」劉辰翁為其撰寫墓誌銘，即丙戌 23 年（1286）。在這同一年，劉應登之弟劉應鳳也過世了，次年即丁亥 24 年（1287），劉應登安葬了父親。劉辰翁生於南宋理宗紹定 5 年（1232），則是小於劉應登的父親 16 歲。劉辰翁與劉應登同一年中進士，劉辰翁時年 31 歲，時間不算晚，劉應登即使很年輕便及第，如同當時的文天祥在 21 歲中式，兩人年紀相差應不至於超過 10 歲。兩人很可能是亦師亦友的關係，而劉辰翁的年紀稍長，名望也高出甚多。

四、劉辰翁批點的動機與典籍

劉辰翁的批點始於李賀（長吉）詩集，而後漸及其他詩人，主要目的是授人以詩學門徑。其子劉將孫稱：

³⁴ 宋·劉辰翁著，段大林校點：〈樂丘處士墓志銘〉，《須溪集》，《劉辰翁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卷 7，頁 226-228。

先君子須溪先生于評諸家詩，最先長吉。蓋乙亥避地山中，無以紓思寄懷，始有意留眼目，開後來。自長吉而後及於諸家。開示其微，使覽者隅反神悟，不能細論也……每見舉長吉詩教學者，謂其思深情濃……最可以發越動悟者在長吉詩。³⁵

南宋恭帝德祐元年乙亥（1275），劉辰翁 44 歲時開始批點唐宋人詩詞，這主要肇因於南宋淪亡，他幾乎隱避不出，家居時間較多。明儒楊慎（1488-1559）〈劉辰翁傳〉有云：

丙子宋亡，萬里死節，辰翁馳哭之。遂托跡方外，隱遯不出……平生耽嗜文史，淹博涵深，為文祖先秦戰國莊老等，言率奇逸，自成一家。有《須溪集》一百卷。嘗評騭唐宋諸家詩，又著《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士林服其賞鑒之精。³⁶

宋亡入元之後，劉辰翁避居山中不仕，開始他數量頗多的評點。其子劉將孫曾把他評點唐宋人的詩詞匯刻為《興觀集》，但也已散失。明代則有人把《李長吉歌詩》、《王摩詰詩》、《杜工部詩》、《蘇東坡詩》、《老子》、《莊子》、《列子》、《班馬異同》以及《世說新語》等九種評點，匯刻為《劉須溪批評九種》。此外，評點所及尚有孟浩然、韋蘇州、孟東野、王荊公、陳簡齋、陸放翁、汪元量等人³⁷，至於先後順序則難以斷定。

劉辰翁晚年身處異族統治時代，如此一位宋朝遺老自然會有許多的感傷，他在評點詩文中寄託了自己憤悶的心聲，明末陳繼儒（1558-1639）即認為，劉辰翁藉著評點以寄寓亡國的情懷。卻也因此成就了他豐碩的的評點功績：

當宋家末造之時……先生豈無恐怖，乃弄筆概文史耶？抑亦德祐前應舉所讀書也……僅取數種殘書，且諷且閱且批，且自寬於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代裂眚痛哭云

³⁵ 元·劉將孫：〈刻長吉詩序〉，《養吾齋集》，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 11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卷 9，頁 157。

³⁶ 轉引自宋·劉辰翁著，段大林校點：《劉辰翁集》，附錄，頁 459。

³⁷ 參見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頁 56-67。

耳。³⁸

科舉制度，宋代施行至南宋度宗 10 年（1274）為止。其後直到元代仁宗延祐年間（1314）才又恢復科舉，中間停辦了 40 年，而劉辰翁也已過世了 18 年。在此期間，文人不必留心舉業，於是無關乎科考的詩文評點乃成為一時的風尚。元初歐陽玄在〈羅舜美詩序〉中指出：

宋末劉須溪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眾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³⁹

南宋以黃庭堅（1045-1105）為主的江西詩派，重視文本細緻的分析、批評，講求作詩的技法。劉辰翁把這種評析的方式用之於詩文評點，使得評點從「取便科舉」的應試指導之用，轉向專論寫作技巧之工拙。況且隨文的評點有利於更直接而具體的分析作品，指導讀者欣賞和創作的法門。

劉辰翁的評點唐宋詩詞，乃是從文學寫作的角度來分析作品，有別於傳統的注疏、訓詁，基本上乃是一種文學批評。

五、劉辰翁的史傳評點

吾人在論斷劉辰翁評點《世說》的角度、態度之前，他的《班馬異同評》不能忽略，而可以作為一種重要的參考。必須對照、比較劉辰翁對於《史記》、《漢書》等史傳中的批語，才能夠確切地論斷《世說》批語的性質。

《班馬異同評》一書，舊題宋人倪思（?-1220）撰，劉辰翁評。《四庫全書》所收錄的只是倪思所編撰的原著，其中沒有批語。附有劉辰翁批語者，則收於後來編成的《四庫存目叢書》。故而《四庫總目提要》誤以為劉辰翁不曾評點過《班馬異

³⁸ 明·陳繼儒：〈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晚香堂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85），卷 1，頁 16。

³⁹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 1210 冊，卷 8，頁 126。

同》一書：

案《通考》之載是書，實據《直齋書錄解題》。使果出於辰翁，則陳振孫時何得先為著錄？是固可不辨而明矣。⁴⁰

吾人翻檢《文獻通考》，其中確實引用了劉辰翁之前的宋人陳振孫（1183-1262）《直齋書錄解題》中的相關內容：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陳氏曰：倪思撰，以班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刪改，大抵務趨簡嚴，然或刪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異則可以知其筆力之優劣，而又知作史述史之法矣。⁴¹

詳加比對《四庫全書》與《四庫存目叢書》中所收錄之書，可知《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與《四庫總目提要》所言者，都是未經劉辰翁評點過的倪思之原書。而《四庫存目叢書》所收錄的《班馬異同評》，則增加了劉辰翁的批語，故而四庫館臣之言，並不能否定劉辰翁評點過《班馬異同》。而前述所引明人楊慎、陳繼儒等人所言劉辰翁評點過此書的說法，比較可信。倪思把《史記》、《漢書》兩者針對同一件事或者同一段情節的異同情形並列出來，相互比較，「二書互勘，長短較然，於史學頗為有功。」⁴²「使讀者尋刪改之意，以見前人之用心。」⁴²劉辰翁的評點便是如此著眼於敘事寫人技巧的分析，基於一種文學寫作的審美角度，極少從事史料的考證、史學的闡述。明代凌稚隆編輯《史記評林》，特別選錄有關章法寫作方面的評析，其中收錄不少劉辰翁對《史記》的批語。試舉劉辰翁的幾則評點加以說明：

敘楚漢會鴻門事，歷歷如目睹，無毫髮滲漉，非十分筆力，模寫不出。⁴³

後之為史者，但曰還沛，置酒，召故人，極歡云云足矣。看他發沛中兒，教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泣下，縷縷不絕，俯仰具見，直到空懸出獻，已去復留，其中與諸母故人道舊又佳，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古今文

⁴⁰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45，史部正史類一，《班馬異同》提要，頁982。

⁴¹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200，經籍27，頁1675。

⁴²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45，史部正史類一，《班馬異同》提要，頁982、983。

⁴³ 宋·倪思撰，劉辰翁評：《班馬異同評》（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1，〈項籍〉，頁52。此刻本之劉辰翁評語，年代久遠，文字已漫漶不清，故本文所引用之幾處評語，多參酌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90），頁403。

字淋漓盡興，言笑有情，少可及此。⁴⁴

將極言有鬼神，卻從無鬼神說，滿傳奇怪，亦不得不爾，引而歸之天，正鄭重。及論其形貌，亦爽然自失，言笑有情，卻不鄭重，極閑散。⁴⁵

劉辰翁固然把《史記》、《漢書》視為正史，但是他的批點《史記》、《漢書》，眼光明顯聚焦在其敘事寫人手法的優劣。劉辰翁之所以稱許《史記》對於鴻門宴等場景的描寫具有「十分筆力」，意指其在徵實、實錄的史家修史前提之下，仍然可以情節生動、人物逼真，實屬十分難能可貴。而小說之敘事寫人，無此實錄的條件限制，故易於達成。

今人常以現代小說的觀念，論斷中國古代史傳、小說與詩文的敘事寫人之藝術，以為只要是以文學、審美性質的手法加諸於人物的描寫、塑造，以及事件的鋪陳、敘述，便是「以小說家的眼光、運用小說筆法來評點詩文史傳。」⁴⁶然而，古代中國原本文、史不分，文學的觀念遲至六朝時代才興起。況且《左傳》、《史記》的敘事寫人藝術已很成熟而完善，不少情境的摹寫具有今人所稱之文學性質，是否可以說這兩部史學名著的成功乃是基於「以小說家的眼光、運用小說筆法」？司馬遷把鴻門宴一事描寫得極為細膩、生動，引人入勝，儘管如此，畢竟是歷史事實，也唯有如此的寫法，才能確實表現出當時劍拔弩張的緊張、險惡的局勢。固然史書往往「粗陳梗概」，崇尚簡要，忽略細節瑣事的描寫，但不可因此便把這種細膩刻畫的技法一概稱之為「小說筆法」。

史傳與小說兩者的差異，關鍵並不在於敘事寫人的手法如何。史傳運用今人所謂「小說的筆法」，早在小說誕生之前，兩者的差別主要在於其撰作之目的。史傳運用那些「小說的筆法」，目的在於更真實的表現歷史人物的精神、氣質、性情與言行，用以深刻的傳達歷史真相。由於歷史人、事已成為過去久遠的記憶，為求在有限的篇幅、文字之中，表現真實的歷史面貌，故而採取了今人所謂的一些「小說的筆法」。

⁴⁴ 宋·倪思撰，劉辰翁評：《班馬異同評》，卷2，〈漢高〉，頁84。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頁416。

⁴⁵ 宋·倪思撰，劉辰翁評：《班馬異同評》，卷5，〈張良〉，頁100。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頁611。

⁴⁶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下冊，頁730。

至於，小說採取「小說的筆法」以敘事寫人，則只是力求生動、曲折和趣味，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致，至於歷史真相如何，則並不多加考慮。那些所謂「小說的筆法」，事實上早已存在於一些優良的史傳傑作之中，而不是小說的專利。明末大儒黃宗羲（1610-1695）即曾指斥此種認知上的偏頗：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頗上三毫也。⁴⁷

今人不應再把這種偏頗的看法，用以解讀劉辰翁的評點。劉辰翁看待小說與史傳敘事的態度，與當代著名學者錢鍾書的見解暗合，深知史家雖然崇尚實錄，但並不摒棄合乎情理的推想。錢鍾書表示：

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⁴⁸

史傳敘事無可避免的必須輔以想像之力，以彌補史料文獻之不足，如同小說之編織故事，代擬人物的對話，否則勢必無法紀錄完整。⁴⁹但兩者畢竟有其差異，史傳是以實錄為前提，不能虛構造假，小說則不受此限制，而更應當善加發揮此一特質，以求細膩而生動。劉辰翁在其批語中，顯露出了這種清楚的認識。

六、《世說新語》一書的性質

《世說》應當列入史部，或者屬於小說，影響到劉辰翁評點的歷史地位和價值。這個議題，迄今仍有爭論，而可以溯源至《隋書》。自從《隋書·經籍志》將之歸類

⁴⁷ 明·黃宗羲：〈論文管見〉，《南雷文定》三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3，頁58。

⁴⁸ 錢鍾書：《管錘篇》（北京：三聯書店，2008），〈左傳正義〉一、杜預序，頁271-273。

⁴⁹ 當代史學界已有此種理論主張，例如後現代歷史學家海登·懷特（Hyden White），他把歷史敘事看作是「情節的建構」、「小說創作的運作」，一種文學想像性的解釋。參〔美〕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75-178。

於「子部小說家」之後，幾乎所有重要的官方、私人的書目都將其著錄在「小說家」或「小說」類，包括《舊唐書》、《新唐書》、《崇文總目》、《通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文獻通考》、《百川書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目答問》等。極少數如清人孫星衍的《孫氏祠堂書目》才將之分屬在史書類。然而，民國以來不少史學家與學者擺脫傳統的觀念，力主《世說新語》為史書而不是子部小說。史學家錢穆即如此主張：

實際上《隋書·經籍志》把此書放在子部小說家言已錯了……這部書體例像小說，實是一部極大有關史學的書……而且《世說新語》都是些真確而具體的佳事佳話，不像後來所說的小說，都是無中生有……至於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世說新語》更見非常重要，只是在當時人不很覺得，即如劉知幾也無此眼光。⁵⁰

饒宗頤也稱：

（《世說新語》）自《晉書》粗加甄采，俾作史料；《隋志》列于小說，誤當談助。乃校孝標之注，用招子玄之譏，遽以委巷瑣記目之，於此書大旨，失之遠矣。⁵¹

《世說》一書的性質究竟為何？必須考察此書取材之真偽，編寫之目的，以及敘事寫人之態度。固然此書的取材，多有今日已難得見的珍貴文獻，大有益於六朝人物、事跡的瞭解。然而，「義慶《世說》本雜采眾書，以求新奇，故信《語林》。此史書與小說性質不同之故也。」⁵²此書依據頗多的資料如裴啟《語林》、郭澄之《郭子》等⁵³，不盡可信，再加上編者刻意潤飾、增刪，劉孝標、劉知幾等人都曾經對此有所攻訐。於是「變史家為說家」。⁵⁴試舉〈文學〉第1則以為說明：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

⁵⁰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蘭臺出版社，2001），頁159-163。

⁵¹ 饒宗頤：〈世說新語序〉，收入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上冊（臺北：正文書局，2000），頁1。

⁵² 龔斌：《世說新語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372。

⁵³ 魯迅便以為「《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參氏著：《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1999），第7篇，頁63。

⁵⁴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3冊，卷3，雜家類，頁273。

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迫，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⁵⁵

劉孝標的注，即認為此則內容不合情理，屬於道聽塗說、委巷傳聞的小說：

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⁵⁶

余嘉錫認同劉孝標的看法，從情理上判斷，馬融對於鄭玄的態度，不應前後如此矛盾，所以認定裴啟的《語林》浮誇不實，劉義慶不該取材於此，以致為人所譏詆：

此節蓋采自《語林》，見《御覽》三百九十三，非義慶之所杜撰也。《廣記》二百十五引《異苑》，載有兩說。前一說與此同，後一說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筭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觀《語林》、《異苑》之所載，知此說為晉、宋間人所盛傳。然馬融送別，執手殷勤，有「禮樂皆東」之歎，其愛而贊之如此，何至轉瞬之間，便思殺害！苟非狂易喪心，惡有此事？裴啟既不免矯誣，義慶亦失於輕信。孝標斥為委巷之言，不亦宜乎？⁵⁷

史傳與小說的差別，關鍵即在於材料內容的真偽。所謂「小說」，即指「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⁵⁸不免誇大渲染而失真，以致於真偽並存。「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⁵⁹然而，這些子部小說，大部分都不屬於文學作品。《世說》取材不嚴謹，內容不盡為事實，難以置諸史部，符合子部小說的定義，但具有文學的性質。劉辰翁是一位傳統社會中上階層的

⁵⁵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頁182。

⁵⁶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190。

⁵⁷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189-192。

⁵⁸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臺北：宏業書局，1984），諸子略之小說家，頁444。

⁵⁹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40，子部小說家類一，頁2882。

文士、士大夫，曾任職於史館、書院，必然會受到官方正史觀念的影響，對於史書所應具備的條件要求嚴格，所以他視《世說》為子部小說，從子部小說的角度來批點《世說》。

至於《世說》編寫之目的，魯迅以為此書「為賞心而作」，「遠實用而近娛樂」。⁶⁰從而是有別於史書的小說。梅家玲則借重西方敘事學理論以論斷《世說》的敘事態度與目的⁶¹，以為編寫者把中國史傳「徵實」之目的轉向了「賞心」：

《世說》自敘事傳統中繼承了什麼？又創變了些什麼？簡單的說：它以線性的語言結構鋪展各色生命形相，本是史傳式敘事架構的遺緒；但敘事態度轉為「對生命姿態與形相的賞析」，與敘事時特重「視片段為整體」，和「以顯示代敘述」的原則，則使其別出於傳統敘事軌範，不唯成就特有之整體風貌，亦為日後傳奇小說之寫作，開啟先河。⁶²

從而判斷此書之敘事態度，乃是「以美感的態度去賞析人物言行中的美的品質」⁶³，既然是以「賞心」為撰作之宗旨，即不免有犧牲部分史實的情形，與史傳「徵實」之目的大異其趣。

吾人今日視《世說》為小說，不唯符合傳統的圖書分類，也與劉辰翁評點此書當時的想法與作法一致。然而，不能否定的，《世說》保存了豐富而珍貴的史料，對於瞭解六朝人物的言行事跡，確實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在史學研究上具有不可抹煞的貢獻。

⁶⁰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7篇，頁61。

⁶¹ 〔美〕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65。「敘事是關於過去的。被講述的最早的事件僅僅是由於後來的事件才具有自己的意義，並成為後事的前因。絕大多數科學包含預言，而敘事則包含『後向預言』（retrodition）。是時間系列的結尾——事情最終演變成了什麼——決定著是哪一事件開始了它：我們正是因為結尾才知道它是開端。如果一次偶然相遇或一個周密計劃毫無結果，那它就不是一個開端，無論在小說中還是在現實中。」

⁶² 梅家玲：〈世說新語的敘事藝術〉，《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臺北：里仁書局，2004），頁240。

⁶³ 梅家玲：〈世說新語的敘事藝術〉，《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頁210、237。

七、元刻本《世說》批語的真偽

劉辰翁評點過《世說》一事，歷來少有人質疑，自清末葉昌熾（1849-1917）提出之後，今人潘建國教授也認同「元代坊肆偽托」之說，雖然他曾經肯定過劉辰翁《世說》評點的成就。⁶⁴此種疑慮之產生，部分原因在於明清時代書賈偽托名人的評點之風頗盛，顯著的一個例子即是葉晝偽托李贄的《水滸傳》評點。

潘建國質疑的理由有三：其一、「元刻本各卷卷首題署『須溪劉辰翁批點』，有明顯剗刻痕跡，絕非原刻本所有。」「元刻本之『劉辰翁』批點文字，絕非劉應登初刊時所刻，而是坊肆在原版上竄增補刻。」其二、劉辰翁與劉應登「兩人同鄉兼同宗，交遊甚密」。劉辰翁的評點「自當以一種堂皇的方式刊入文本，而不可能是今本如此草率拙劣的面貌。」況且，「宋末元初與劉辰翁交往較多的文人，如王炎武、趙文、歐陽玄、王夢應等人，包括其子劉將孫，皆從未提及劉辰翁曾經批點《世說新語》。」其三、劉辰翁評點的文字，「其中若干評點乃針對劉應登批注而發，可知其撰寫時間肯定在劉應登刊本《世說新語》印行之後。」「審其語氣，此『劉辰翁』對劉應登頗多譏諷，衡以二劉之交誼，「絕無可能出於劉辰翁之手」。⁶⁵

若能夠針對上述三項質疑有所討論、考辨，必然有助於解答元刻本《世說》劉辰翁批語的真偽問題，以下逐項釐清之。

（一）、元刻本《世說》刊刻的時間

目前收藏在國家圖書館的元刊八卷本《世說》實有兩部，其版式、行款及題署文字相同，但劉辰翁批語的字體差異甚大，位置與內容也略有出入，兩本有先後翻刻的情況。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善本書敘錄」稱年代在前者為「劉應登原刊、元坊肆增刊評語本」，而後出翻刻前者的為「元坊刊本」。潘建國則分別稱之為「台甲本」、「台乙本」。本文為了論述便利，以下便以「台甲本」、「台乙本」稱之，這兩部

⁶⁴ 潘建國：〈凌濛初刊刻評點世說新語考述〉，《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3：5（2004.9），頁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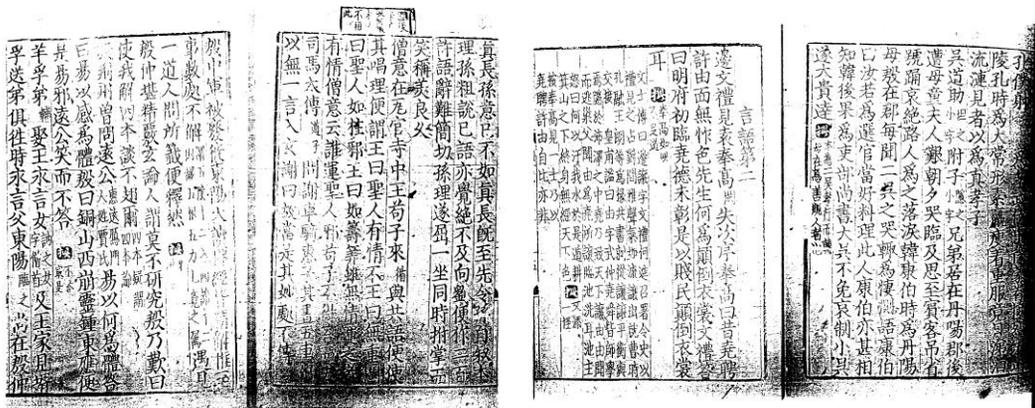
⁶⁵ 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係元代坊肆偽托〉，頁76。

書都是元刻本⁶⁶，其論證見於下文。「館藏善本書敘錄」對於這兩部書的版式、行款、刊刻年代等狀況都有所說明，判定皆刊刻於元代：

（劉應登原刊元坊肆增刊評語本）元至元 24 年（1287），朱筆圈點。正文卷端題「世說新語卷之一，宋臨川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須溪劉辰翁批點」。序：「劉應登敘」。10 行，行 17 字。註文小字雙行，字數同。左右雙欄，版心小黑口，雙黑魚尾，「恆」、「桓」缺末筆。（清）葉昌熾手書題記。8 冊；（匡 17.7×12.1 公分）

（元坊刊本）朱墨批。卷三及卷七卷八首葉題「世說新語卷第一，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須溪劉辰翁批點」。序：「劉應登敘」。10 行，行 17 字，註文小字雙行，字數同。左右雙欄，版心小黑口，雙黑魚尾，上間記大小字數。此本劉批亦皆擠刻於每節末行，當亦為後來補刻者。首冊書面有近人袁克文手書，定為「元刊本」。審其版式、行款、尺寸及卷首撰注題名處之空格等相同情況，當據元至元本翻刻者。8 冊；（匡 17.7×12.5 公分）⁶⁷

劉應登原刊元坊肆增刊評語本《世說新語》書影如下：



兩部書之前皆有劉應登的〈序〉，說明他刊刻此書的緣由、時間，以及他所作的整理：

⁶⁶ 潘建國根據明代正德 4 年（1509）趙俊刻本比勘，認為此一「台乙本」（元坊刊本）「非是元刻，實為明正德翻刻元本」。參氏著：〈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係元代坊肆偽托〉，頁 68。

⁶⁷ 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http://aleweb.ncl.edu.tw/>），「題名」輸入「世說新語八卷」，「出版者」點選「元至元二十四年」，「一般註」項。

（《世說》）雖典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索解人正不可得……丙戌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剗其長注，間疏其滯義。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

從其中的元代版式特徵「左右雙欄，版心小黑口，雙黑魚尾」，顏體字⁶⁸，以及避諱的情況：「恆」、「桓」二字缺末筆，僅避諱宋真宗趙恆、宋欽宗趙桓二人，而不似宋代通行的董弁本「避諱之字甚多，包括桓、竟、敬、胤、玄、慎、殷、徵等」。⁶⁹從此一版式混亂的現象可推知，劉應登的家藏本原為宋版，但重新刊刻於元代，所以具有元版的特徵，卻仍遺留下少數缺筆避諱宋代皇帝的情形。

台甲本前另有清末葉昌熾〈題詞〉，對於此書的刊刻、版式與評點等都有一些推斷：

此書舊有二刻，一王弇州本，一袁褰本，皆三卷。此本八卷，耘廬劉應登刊，舊注刪節，十無二三，間有應登自注，隨文訓釋，無所發明。其自序云：「丙戌長夏，病思無聊，手校家本，明年授梓。」書中遇宋諱缺筆，應登當為宋人，丙戌，理宗寶慶二年也。然中有須溪劉辰翁評，辰翁宋末人，宋亡上距寶慶丙戌計四十年，其評未行，應登無由采之，反覆審諦，迺知後來所竄入。何以言之，前二卷題名剗去未刊，卷三始題云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為一行，須溪劉辰翁批點為一行。此必原刻撰人、注人分列二行，後并為一行。即以所空一行補刻劉辰翁姓氏。前二卷偶脫之，或是補刻不堅，隨即損落。評語皆在各條末行補刻，末行無空，則移上方。亦有竟剗去本文，重為撰刻，以留餘地，無越行者，此尤補刊之迹，顯然可認。原刻頗精，補入之字不堪寓目。蓋宋元之際，辰翁評本如少陵詩之類盛行，於時坊肆借以炫售之。每半葉十行，大小皆十七字。以今本勘之，卷一管甯、華歆鉏菜一則，

⁶⁸ 參考王欣夫：《文獻學講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 209-225。陳紅彥：《元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頁 29-32。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249-271。

⁶⁹ 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係元代坊肆偽托〉，頁 69。

今本與上一則誤合為一，此本不誤，字亦頗有異同。⁷⁰

刊刻的時間，根據劉應登的序文，應是丙戌年，葉昌熾認為此一丙戌年是南宋理宗寶慶 2 年（1226），此一推斷並不正確。比對劉辰翁、劉應登兩人的生平來看，丙戌年最有可能的時間是元世祖至元 24 年（1287）⁷¹，當時劉辰翁 56 歲，推斷劉應登的年紀略大於 46 歲比較合乎情理。此外，上文已從版式、行款、字體等情形推斷其為元代的刻本。也提及劉辰翁曾受劉應登所託，為其父撰寫墓誌銘，時間在至元 23 年丙戌（1286）。從而劉應登所謂的《世說》校刊於「丙戌長夏」，即是他在家為父守喪期間的至元 23 年（1286）。「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歷時一年的時間，即在至元 24 年（1287）的 5 月中旬，此一台甲本《世說》的原本問世了。此一初刊的原本，其上只有劉應登的批注，而無劉辰翁的評點。現存的附有劉辰翁批語的兩種元刻本《世說》，刊刻的時間更晚，時間至少是在 10 年之後，當時劉辰翁已然過世（1297），無法過問此書的刊行，故而元刻本上的劉辰翁批語之字體「草率拙劣」、「補入之字不堪寓目」、內容「頗多譏諷」。

（二）、元刻本二劉批點的先後及其真偽

葉昌熾認為劉辰翁的批語是後來補刻上去的，這個推斷很正確。因為劉辰翁批語的字體擁擠、凌亂、大小不一，且多俗字、簡字，其中挖補的痕跡很明顯。更有少數幾個批語被排擠在版框之上，因為篇末已無足夠的空間，其文字都是很勉強擠入的。然而，這些後來才補刻進的文字，並不能遽而認定即是坊肆的作偽，此一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考量。

首先，從兩人的交誼來看，劉應登初刊此書時應無劉辰翁的批語，否則何以劉應登的自序僅提及自己作注，而不提劉辰翁那些數量頗多而且遠超過他自己的批語？

⁷⁰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點：《世說新語》（元至元 24 年劉應登原刊元坊肆增刊評語本），卷 1。此一古籍版本因無頁碼，故其後凡徵引此書內容者，皆於引文後標示門類則數，不另一一作註，以避免繁瑣。

⁷¹ 可參看朱鑄禹所作的年代考訂，參氏著：《世說新語彙校集注》，序例，頁 4。

再者，從《世說》版本演變來看。南朝之時，劉義慶（403-444）《世說》原為八卷，劉孝標（462-521）作注乃析為十卷。宋代以來，此書卷帙頗有變化。歷經晏殊（991-1055）、董弅等人相繼整理、刪定，改成了上、中、下三卷，每卷再分上、下。爾後，陸游（1125-1210）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間重刊董本之後，明代袁褰嘉趣堂本（今四部叢刊本）、清代周心如紛欣閣本以及王先謙思賢講舍本等後世通行的版本，都是從董弅三卷本而來。劉應登所校刊的元刻本則有八卷，與劉義慶的原書相同，有別於通行的董弅本，可見其來源不同，而有可能更為古老。此一元刻本《世說》「刊刻的認真以及校對的細緻，使元刻本正文之中明顯誤刻之字大為減少。」⁷²顯見劉應登為了刊刻此書投入了許多工夫，其目的在於力求一部內容無訛、注解簡要，適合一般大眾閱讀的較為通俗的本子。

宋代的《世說》版本既然有多種，其中紹興年間董弅刊本更受到推重，元代坊肆何以不就這一較為通行的版本增列劉辰翁的批語？卻要選中較不為人知的劉應登自行刊刻的刪改本？其中原因應當是劉辰翁即是根據劉應登至元年間的新刊本來評點，且有部分批語是針對劉應登的批注而發，書賈坊肆按頁增補進去，有其刊刻編排的便利，是以劉應登的批注時間應當早於劉辰翁。

從兩人批點的位置也可以增強此一看法。劉應登的批注，往往在每則正文末尾以「按」或「謂」字起首注解。劉辰翁批語的位置則多在劉孝標注與劉應登批語之後，在其空白處，以一反白「批」字標明，很符合他一貫批點書籍的作法與形態。周采泉《杜集書錄》便指出此特點：

宋人註杜均在句下，劉批皆在篇末，另以方框標「批」字，此為創格。⁷³

更有力的證據是有幾處劉辰翁的批語，可以看出是針對劉應登的批語來評論的。對此，已經有學者指出了，故僅舉兩個例子說明。例如《政事》第3則：

⁷² 潘建國詳細比勘多種版本文字的異同，以及避宋諱的情形，以為元刻本極為接近現存三種宋本之一的「湘中本」。「元刻本的底本是一個文貌與湘中本極為接近的宋本，而且是今存晏殊本版本系統中文貌最為古老的一種。」參見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係元代坊肆偽托〉，頁71。

⁷³ 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1。

陳元方在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⁷⁴

劉應登針對「先父」一詞之怪異，作了解釋：

時元方尚小，仲弓必在，而稱為先父，不以為諱。

劉辰翁對於此一牽強的說解很不滿意：

必無父在稱先父之理，未可以年十一故，意之如此。註書或誤來者。

劉辰翁顯然是針對劉應登的批注而言，因為劉孝標在此並沒有特別對「先父」一詞有所箋注。考諸其他版本，大多作「老父」，顯然「先父」是字誤⁷⁵，所以劉孝標不注，劉應登強作解人，是以被劉辰翁所譏。又如《德行》第 28 則：

鄧攸始避難，于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⁷⁶

劉應登批注：

按攸棄兒全姪，局於勢之不可兩全爾。兒追及之，繫之而去，毋乃無人心、天理乎？不復有子。於此見天道之不可誣也。

劉應登認為鄧攸捨棄自己兒子以保全弟弟的兒子，乃是迫於形勢，情有可原。但是鄧攸把自己的兒子網綁在樹上，不使其追隨，此種行徑則違反人性、天理。導致後來所納娶的妾，竟然是自己的外甥女，而令其品德有虧，這是一種上天對於鄧攸所施加的懲罰、報應。劉辰翁則不以為然，他認為鄧攸的行為固然不可稱為義行，但是把誤娶自己外甥女為妾一事，看作是報應，也是不對的。批語云：

⁷⁴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165。

⁷⁵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按語即稱：「老，宋本作「先」，非。今依袁本……紀年十一，寔已四十矣，作『老父』是也。」參前揭書，頁 147。作「先父」的版本不多，可見劉氏兩人是用同一個版本，這也說明了劉辰翁是直接評點劉應登校刻的本子。

⁷⁶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29。

謂係[繫]兒樹上者，喜談全姪，而甚之也。使其追及，任所能行，何事於係[繫]？言係[繫]者謬，罪係[繫]又非。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德行》第 37 則，劉應登批注「謂恐因彈鼠而誤發傷人也。」劉辰翁對此不滿的說：「解誤，可笑。」這樣明顯地嘲諷而不顧交誼，其中可能的原因，應當是劉辰翁只是習慣性地一邊閱讀而信手記下自己的感想罷了，原本並不打算公開與刊刻的，是以措辭無所顧忌。

綜合以上的考辨，劉應登在元代刊刻《世說》之後，基於兩人交誼，曾經把此書贈送給了同榜、「同鄉又同宗」的劉辰翁。書籍刊行後，劉辰翁又活了 10 年，很可能便是在此段晚年的歲月，劉辰翁即就此本加以閱讀、批點，留下了他的批語。其後書肆再翻刻此書之時，便直接就劉應登的原版補刻進劉辰翁的批語，藉以行銷兜售，故而書中補刻的文字、位置都顯得凌亂、擁擠，與秀美的顏體正文及劉應登批注的字體迥然不同。而且從坊肆保留下劉辰翁譏諷劉應登的批語來看，書賈的刊刻此書可能沒有經過劉辰翁、劉應登甚至其後人的同意，很可能是書賈坊肆自行增加補刻進了劉辰翁的批語，從而有這些現象的存在。

劉辰翁是直接批點在劉應登所校刻的《世說》，其上的批語不是坊肆偽托的，否則沒有必要故意去譏諷劉應登，這些少數具有針對性的譏諷批語，反而使元刻本更加真實可信。此外，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劉辰翁曾經批點過其他版本的《世說》。

八、劉應登校注《世說》

劉應登對於《世說》所作的整理，首先是「手校家本」，對於錯亂的篇什有所校定。此種作法，劉應登之前早已有晏殊、董弅等人如此處理過，原因即在於宋初以來，《世說》版式淆亂的情形很嚴重。楊勇即稱：

趙宋之初，此書板式極亂，錯簡脫混，莫可究詰。乃由晏殊之徒為之校定，盡去其重；復經董弅刪訂，於紹興八年，勒為三卷，刻之嚴州。自後《世說》

原來門第既失，而董刻遂為百世之準式矣。⁷⁷

其次則是劉應登所稱之「精剗其長注，間疏其滯義」，對於劉孝標浩繁的箋注，主要是經史中的典故名物，加以節略文字、概括大意，以及針對正文語義模糊之處加以說明、提示，少部分則是對於人、事有所評論，這是劉應登批注的主要內容。劉孝標作註，「所用書四百餘種」，「徵引浩博，或駁或申」⁷⁸，使《世說》成為了一部學者專門之書，造成了閱讀的障礙。劉應登有感於此，故加以刪減、簡化，用以適合一般大眾的需求。董弅也曾經如此刪裁舊注：

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裁，最為善本。⁷⁹

況且，劉應登刊刻的年代已經是蒙元統治時期，學術、文化、文藝的氛圍已非宋代的崇尚典雅，而走向了通俗化的大趨勢。劉應登的整理工作，即是一種典籍的通俗化。總計他 120 條左右的批注，大多是把劉孝標的注疏，刪裁成簡要的說明。例如，〈德行〉第一則記載「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在「有澄清天下之志」句下，原有劉孝標的注：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埽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埽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⁸⁰

在「為豫章太守」句下，也原有劉孝標引經據典的注：

《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⁸¹

劉應登把劉孝標的這兩個箋注刪除了，只以簡略的「仲舉名蕃」替代。如此的作法雖不失簡明，卻沒有提供足夠的人物生平、時代背景的介紹，讀者只能夠有粗淺的

⁷⁷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22。

⁷⁸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 7 篇，頁 63。

⁷⁹ 宋·董弅：《世說新語跋》，收入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頁 263。

⁸⁰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1。

⁸¹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1。

認識，這反映了劉應登給予這部書的定位，只是作為一般的讀物。至於劉應登個人所作的批注，可見以下幾條：

按謝公之言，即子真之意，不過身教而已。但安石雅善清言，故其辭微旨遠，子真不過直致。《世說》取此棄彼，亦言語文字之法也。（〈德行〉，第 36 則）

此亦戲言，謂羊公清德，自佳而已，不如銅雀臺上妓，可以娛人耳目。（〈言語〉，第 86 則）

民乃自稱之辭，謂身有長短，當時聞之不悉，在後方覺爾。（〈政事〉，第 13 則）

按融字季長，玄字康成。師友之懿如此，而謂融忌其能，使人追殺之，有此理否？玄又先疑其師追之，預坐橋下。融以其在土下水上便以為死。皆謬亂之辭。此一節當止於「禮樂皆東」之一句。（〈文學〉，第 1 則）

劉應登的批注主要在於闡明各章文意，減少讀者閱讀的困難，屬於傳統的章句注疏範疇。中國經傳注疏的體式，漢代即已發展成熟。箋注、訓詁的方法、格式與內容，都已經形成了一套頗為完備的規範。⁸²劉應登崇尚簡要的箋注，所以把劉孝標詳盡的注文，加以節略、概括，也對於《世說》原文中難以理解的部分加上個人的揣測。他的批注，目的在於解說章旨、語詞及人物的生平，雖然也有對於其中人、事方面的個人看法，但數量極少，更欠缺文學、美學性質的評析，不屬於文學批評。儘管其批注的時間早於劉辰翁，但難以視為小說評點。⁸³

明清以來的學者由於大多未能親見元刻本的批點，因此多誤加指責。錯把劉應登所作的刪節，歸罪於劉辰翁。楊慎〈世說舊注序〉：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奧帙，後劉須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⁸⁴

不少難得一見的文獻資料，差點就因為劉應登的刪節而遺失了，幸好尚其他的《世

⁸² 周大璞：《訓詁學》（臺北：洪葉文化公司，2000），頁 395-414。

⁸³ 譚帆對於小說「評點」有所界定，他認為在內涵上，「評點在總體上屬於文學批評範疇，是一種對於文學作品的評價、判斷和分析。」參氏著：《中國小說評點研究》，頁 6。

⁸⁴ 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上冊，頁 266。

說》版本保存下來。清代著名的版本學家、藏書家錢曾（1629-1701）也予以指斥：

說詩至嚴滄浪而詩亡，論文至劉須溪而文喪。此書經須溪淆亂卷帙，妄為批點，殆將喪斯文之一端也歟！⁸⁵

清末學者李慈銘也歸罪劉辰翁的刪除注文：「此書遭劉辰翁、王世懋兩次刪補，殊堪痛恨。劉孝標之注更零落不全。」⁸⁶事實上，任意刪節舊注的是劉應登而非劉辰翁。這肇因於劉應登文名遠不及劉辰翁，且後世多未能親見劉應登的元刻本。漢代以來對於典籍的注解多偏於繁瑣，劉辰翁所評點刊行的書籍也確實曾經為此大加刪節，但《世說》一書箋注內容的刪減，卻不是劉辰翁所為。

九、劉辰翁《世說》批語的內涵

（一）、以評詩論文的精神與原則評點《世說》

劉辰翁重視文學批評的功用，他認為不僅有助於讀者的鑑賞，也有助於作者寫作能力的提昇，從而評點了不少唐宋詩人的作品，其中的主要精神與原則常見於他的書信、序跋之中。他強調「詩難評，觀詩亦復未易。」⁸⁷「予評唐宋諸家，類反覆作者深意，跋涉何限。」⁸⁸「舊看長吉詩、固喜其才、亦厭其澀。落筆細讀、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觀不到此也。」⁸⁹「千年長吉、余甫知之耳、詩之難讀如此。」⁸⁹他認為確切理解一首好的作品並不容易，因為乃是作者嘔心瀝血而成，其中蘊藏有許多匠心、苦心，必須反覆仔細玩味，才能有所體會，所以初學者勢必要藉助他人的引導。

⁸⁵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3冊，卷3，雜家類，頁272-273。

⁸⁶ 清·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0），子部小說家類，頁849。

⁸⁷ 宋·劉辰翁著，段大林校點：〈韋蘇州詩序〉，《劉辰翁集》，頁439。

⁸⁸ 宋·劉辰翁著，段大林校點：〈題劉玉田選杜詩〉，《劉辰翁集》，頁207。

⁸⁹ 唐·李賀作，宋·劉辰翁評點，明·吳正子箋註：〈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總評〉，《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1078冊，頁7。

他認為優秀的作品雖然不易理解，但是內涵豐富，深入挖掘，必有收穫。但也由於讀者的生平、學問與性情等條件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感悟和體會。「觀詩各隨所得，別自有用。」⁹⁰同時，也緣於讀者條件的種種差別，作品的批評與理解可以有所不同，從而也賦予了作品新的風貌，並且豐富了作品的義涵。「凡大人語，不拘一義，亦其通脫透活自然。」⁹¹「無數詩經評泊，別是眉目。」⁹²這種看法，頗暗合當代的詮釋學、讀者反應理論。綜觀他的這些主張，大致可以歸納成三點：1、重視語文修辭的藝術審美；2、強調作品的個人體會與詮釋；3、批評方法的靈活而不拘一格。

以下便以《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一書中的劉辰翁評點，以見其精神、原則與形態：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李賀〈蘇小小墓〉）⁹³

第1句下夾批：「便是墓中語。」第4句下夾批：「妙極自然。」總評：「參差苦澀，無限慘黯。若無同心，語亦不為到。此蘇小小墓也。妖麗閃爍間，意固不欲，其近洛神賦耳。古今鬼語，無此慘澹盡情。本於樂章，而以近體變化之，故奇澀不厭。冷翠燭，勞光彩，似李夫人賦。西陵語括〈山鬼〉更佳。」⁹⁴

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回死？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烟。箏人勸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問誰？不須浪飲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羞見秋眉換新綠，二十男兒那刺促？（李賀〈浩

⁹⁰ 宋·劉辰翁著，段大林校點：〈題劉玉田選杜詩〉，《劉辰翁集》，頁207。

⁹¹ 宋·劉辰翁著，段大林校點：〈題劉玉田選杜詩〉，《劉辰翁集》，頁207。

⁹² 宋·劉辰翁著，段大林校點：〈韋蘇州詩序〉，《劉辰翁集》，頁439。

⁹³ 唐·李賀作，宋·劉辰翁評點，明·吳正子箋註：《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1078冊，卷1，頁21。

⁹⁴ 唐·李賀作，宋·劉辰翁評點，明·吳正子箋註：《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1078冊，卷1，頁21。

歌))⁹⁵

第9句下夾批：「李白有〈丁都護歌〉云：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第10句下夾批：「跌蕩愁人。」第12句下夾批：「世上英雄本無主，傑特名言。繡作酒澆，肝肺激烈。」第14句下夾批：「亦不知何從至此。」總評：「從南風起一句，便不可及。迭蕩宛轉，沈著起伏，真俠少年之度。忽顧美人，情景俱至，妙處不必可解。」⁹⁶

劉辰翁對於詩歌之評點，內涵大致如上。他的這些詩歌評點，微觀細膩的剖析文字，具有個人獨到而且深刻的體悟，也顯露出傳統隨文評點的優點和缺點。優點在於能夠立即的給予讀者直接的意見，針對個別的字句、修辭和章法作出評論。而劉辰翁的見解也確實能夠把握住作品的藝術特點，指出其精微的匠心所在，有益於讀者對於作品的理解及學習。缺點則是受限於文本的形式和空間，無法深入而詳盡的分析，往往只是一些印象式的概括和感悟，不免流於瑣碎而缺乏體系。從而對於劉辰翁的各類評點，出現了褒貶不一的情況。楊慎、王士禎等人頗多推崇，楊慎稱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⁹⁷然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卻持相反的意見，認為「辰翁論詩評文，往往意取尖新，太傷佻巧」，「大率破碎纖仄，無裨來學。」⁹⁸

辰翁論詩，以幽雋為宗，逗後來竟陵弊體。所評杜詩，每舍其大而求其細。王士禎頗極稱之。好惡之偏，殆不可解。惟評賀詩，其宗派見解，乃頗相近，故所得較多。⁹⁹

對於劉辰翁之負面評價，多指斥其眼光細碎而欠缺宏觀，這應當與評點形態的侷限有關，事實上，他也有不少宏觀而具有系統的批評文章，多收錄於《須溪集》之中。

錢鍾書論及陸雲〈與兄平原書〉時，針對評點的性質、功用有所說明：

⁹⁵ 唐·李賀作，宋·劉辰翁評點，明·吳正子箋註：《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1078冊，卷1，頁31。

⁹⁶ 唐·李賀作，宋·劉辰翁評點，明·吳正子箋註：《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1078冊，卷1，頁31。

⁹⁷ 明·楊慎：《劉辰翁傳》，收入宋·劉辰翁著，段大林校點：《劉辰翁集》，附錄，頁459。

⁹⁸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5，集部18，別集類18，《須溪集》提要，頁3434。

⁹⁹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0，集部3，別集類3，《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提要，頁3154。

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姚合〈游春〉批語謂：「詩家有大判斷，有小結裏」；評點、批改側重成章之詞句，而忽略造藝之本原，常以「小結裏」為務。¹⁰⁰

元人方回（1227-1305）論詩之所謂「大判斷」，當是指詩歌創作追求「詩體渾大、格高語壯」¹⁰¹、「格高，而意又到，語又工，為上。」¹⁰²「小結裏」則是指一心在文字上雕琢，晚唐詩之所以格調卑靡，便在於「下細功夫，作小結裏」¹⁰³，捨本而逐末。

錢鍾書認為評點由於其形態的侷限，故而側重詞句的評析，多屬於「小結裏」。劉辰翁本身既是詩詞名家，具有深厚的文學素養，又曾批點詩文多種，自然會把批點詩文的「小結裏」手法用在小說等其他文類，也側重在句法、字法的分析，留心於敘事寫人的文筆技巧。是以劉辰翁的批點《世說》，其實是把評詩論文的「下細功夫，作小結裏」之方法運用在小說，具體的例證見於下文的說明。

（二）、小說不尚實錄，情節「大勝史筆」

《世說》著重人物的清談、軼事的記載，從而也影響到劉批的取向，主要表現在品藻（語言、修辭）、識鑒（人物、情節）兩方面。〈賞譽第八〉之卷末，劉批：「《世說》之作，正在識鑒、品藻兩種耳。余[餘]備門類，不得不有，亦不盡然。」劉辰翁《世說》批語的內涵已經有不少學者論之甚詳，但對於本文來說，其中是否具有文學批評價值？是否屬於文學、美學性質的評點？是否為「站在小說文體角度，論及《世說新語》之結構、人物、語言及修辭等環節」¹⁰⁴？是否受到宋元市民文化、說話、話本的影響？這些才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其餘議題可以暫且不論。

綜觀劉辰翁的《世說》批語，並且與先前所評點過的《史記》、《漢書》相較，可知劉辰翁對於小說寫作筆法之肯定，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他所謂的「小說」，指

¹⁰⁰ 錢鍾書：《管錐篇》，〈全晉文卷 102〉，頁 1215。

¹⁰¹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15，評陳子昂〈晚次樂鄉縣〉，頁 529。

¹⁰²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卷 21，評曾茶山〈上元日大雪〉，頁 894。

¹⁰³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卷 15，評陳子昂〈晚次樂鄉縣〉，頁 529。

¹⁰⁴ 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係元代坊肆偽托〉，頁 76。

的是憑空虛構，沒有事實根據的「子部小說」，乃是與以實錄為目的之史傳相對而言。這是一種中國古代文人傳統的小說觀，最普遍的看法。例如劉辰翁在《南華經》卷14〈則陽〉開篇批曰：

薦人必待其所敬，人能言之。此從夷節歸上生得枝葉活，若但言夷節不若公閱休，亦無意思。雖小說，說亦必有情致。¹⁰⁵

他把《莊子》視為小說，並且強調小說的內容須有情致。此外，《南華經》卷6〈胠篋〉：「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句上，他批云：

起語突兀，本是小說家，充拓變態，至不可破。他人著書，證以數語已不啻。其妙在三反四覆，馳驟之極，卒歸於道德之意。雖盡人間情偽，終以設喻，此其不可執著者。謂其憤疾，直淺淺者也。¹⁰⁶

由於小說不拘於事實，可以盡情想像，從而其情節容易曲折引人，富有情致，但也往往過於離奇，令人感到誇大不實而生厭。劉辰翁評論史傳的此種看法更為顯明，例如評〈留侯世家〉，從敘事寫人的筆法來審視張良事跡的鋪陳：

（張良）從滄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錐舉於曠野之外，而正中副車，雖炮架不如也。如此大索而不能得良，非自免並隱力士，此大怪事。卒歸圯上老父，又極從容，如同時親見，乃今人以為小說不足信者，即子房時時自道，容有疑之者也。此皆不可意測，不可語解，但覺古人如在目前，亦不足辨。妙處正在「履我」，又「業」已如此，省此，頓失數倍意態。「隨目之」亦不可先。蓋如見其人，如聞其語。「黃石」句，「常習誦讀」，寫得皆不偶然。試使子房自己或後人得傳，必為不能知子長之曲折具略不少省何也。（《班馬異同評》卷5）¹⁰⁷

他讚嘆司馬遷的敘事高妙，雖是撰作史書，不可浮誇不實，卻仍能曲折動人，情節精采更勝小說。評〈司馬相如傳〉，則強調史傳的記載若能善用小說構設情節的手法，

¹⁰⁵ 宋·劉辰翁：《莊子南華真經點校》，收入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頁479。

¹⁰⁶ 宋·劉辰翁：《莊子南華真經點校》，收入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一），頁202。

¹⁰⁷ 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頁610。

將更為生動可觀：

賦成而王卒，而困，是臨邛令哀故人之困。豈無他料理，顧相與設畫，次第出此言，是一段小說耳。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蓋至俚褻，而尤可觀。使後人為之，則穢矣。（《班馬異同評》卷 26）¹⁰⁸

評崩通之事，進而提出敘事寫人不可拘泥呆板，必須配合人物、事件的特性，靈活變通，巧為布置：

太史公置酈生〈崩通傳〉內，觀其言武涉已去，崩通又來，此豈可以常法拘？其中有成安、廣武，又有說龍且者，隨事隨筆，跋涉愈多，豈不能別為〈崩通傳〉哉？《漢書》移此於彼，兒童之見也。（《班馬異同評》卷 11）¹⁰⁹

在比較《史記》、《漢書》對於同一件人事的敘述、描寫中，對比出《史記》的不拘史法，採用文學的技法寫人敘事，而更能夠傳神寫照，把握住歷史人物的精神、意態。其後更從《世說》一書，當時視為不盡事實的「子部小說」之中，再次驗證了不受限於史筆，善用適當的想像，更能夠獲致敘事寫人的成功，從而肯定了小說之寫人、敘事，其曲折、生動往往可以「大勝史筆」。

以下舉出幾則具體的批語，作為說明的例證。《世說》〈德行〉第 45 則：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¹¹⁰

劉辰翁批「如此細事，寫得宛至，更看不厭。」讚賞此類閭巷瑣事的敘述，委婉而有情致，相較於史書之多記載「君國大事」，更令人感到趣味盎然。〈文學〉第 53 則：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

¹⁰⁸ 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頁 809。

¹⁰⁹ 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頁 760。

¹¹⁰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49。

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宰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¹¹¹

劉辰翁批「此纖悉曲折可尚。」他很肯定事件的記載，細緻而又曲折，引人入勝，始終能夠吸引住讀者的目光，令人出乎意料，並且感到情意綿長。劉辰翁以為，這種編織情節的敘事藝術頗為高明，值得學習、仿效。〈容止〉第1則：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¹¹²

劉辰翁批「謂追殺此使，乃小說常情。」他認為小說寫作之目的，既然是以令讀者感到趣味為主，情節的曲折離奇，乃是必然的安排與要求。從而「追殺使者」此一令人驚奇的結尾，儘管可能違背了史實，但這便是小說的特質。

此外，在其多達 440 條左右的《世說》批語，其中涉及到小說寫作之處，明顯者約有以下數十條，表現出他評點《史記》以來一貫的對於小說的見解。但《世說》每則的文字簡短，篇幅遠小於《史記》，所以劉辰翁的批語也簡短許多，而流於片斷、零碎。以下分成人物刻畫、言語說話以及情節敘事三類，條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批語，以示其整體的樣貌與特點，減少以偏概全之嫌：

1、人物刻畫：

形容甚至。(〈德行〉第 19)

无緊无要，有襟有度。(〈德行〉第 44)

俯仰情至。(〈言語〉第 31)

¹¹¹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235、236。

¹¹²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607。

- 有女子風致，愈覺灑鹽之俗。（〈言語〉第 71）
大是乖漢。（〈政事〉第 21）
貴公子態耳，何與方正。（〈方正〉第 13）
如怒、如笑。（〈方正〉第 44）
勝負本不待此，寫得祖士少慚忤殺人。（〈雅量〉第 15）
寫得鄭重可憎。（〈規箴〉第 14）
真陶母。（〈賢媛〉第 20）
「故作爾」三字，極得情態。（〈簡傲〉第 12）
甚得駭態。（〈簡傲〉第 14）
備極世情。（〈簡傲〉第 15）
真有如此強口者，《世說》雖鄙，然種種備。（〈假譎〉第 13）
此怒亦何可少。（〈黜免〉第 2）
二怒皆可觀。（〈黜免〉第 4）
何物俗狀。（〈忿狷〉第 7）

2、言語說話：

- 家翁語。（〈德行〉第 8）
俗人薄語，正是不得不爾。（〈德行〉第 42）
似癡似懶，似多似少，轉使柔情易斷，非丈夫語，然非我輩，未易能言。（〈言語〉第 32）
非小兒語。（〈言語〉第 51）
寫得沈至，正在後八字耳。若止於桓大口語，安得如此悽愴？（〈言語〉第 55）
小兒學語，體格未成，利錐書袋，面目可憎。（〈言語〉第 93）
自家潦倒，憂及兒輩，真鍾情語也。此少有喻者。（〈言語〉第 62）
此豈王夷甫口中語？可笑可憎，市門婦所不道。（〈文學〉第 19）
各情性所近，非謝公識量，此語為沓拖，誰省？（〈文學〉第 52）
是謝公語別。（〈文學〉第 94）
語甚感動，節次皆是。（〈方正〉第 4）
是纏綿語。又云：宛曲細碎可觀。（〈方正〉第 25）
是道人語。（〈雅量〉第 32）

語煩。(《品藻》第36)

婦人語。(《容止》第16)

市井笑語。(《任誕》第17)

說得甚近人意。(《輕詆》第33)

矜咳極不成語，然極有似。(《忿狷》第6)

《世說》所載，多无識俚語，然皆今人所有語用之，則古亦不可謂無，故自未可棄耳。即小小字面，亦不當忽，无暇細評。(全書卷末)

3、情節敘事：

寫得可觀。(《德行》第10)

《世說》長處在寫一時小小節次，如見、可想。(《言語》第33)

不應送客盡能驢鳴。(《傷逝》第1)

語悉世情，可以有省。(《賢媛》第25)

亦似小說書袋子。(《簡傲》第11)

自非露臥，劍至即止，又不如遷以避之。小說多巧。(《假譎》第5)

小說取笑，豈有熟薤更種耶？陶未易愚。(《儉嗇》第8)

情理具是具是。(《讒險》第3)

此等較有俯仰，大勝史筆。(《尤悔》第13)

劉辰翁能夠注意到不同階層、行業、性情、性別及年紀的人物，其語言、動作的差異。他認為只有貼切的表現出人物真實的性格、語言，行為合乎情理，才能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劉辰翁之評《世說》，注重為文的法則，也涉及到人生體悟、審美趣味等更深入的層次。他是以文學審美的眼光評人論事，談論寫作技巧，這與他先前評點唐宋詩文的態度及用語相似，都受到了傳統詩話、古文評點選本的影響。他從文學寫作的角度來審察敘事文，虛構或者事實與否便不是首要關注的問題。小說既然不受限於史實，便應當善加發揮此項優勢，力求情節的安排不僅曲折動人，出人意料之外，並且合情合理。這些是他批語的重點所在，也是評斷敘事文優劣與否的關鍵。

劉辰翁難能可貴的能夠在強大的史學文化傳統下，正視虛構、想像的價值。他以為小說所記之人事，真偽並存，故為士人所輕，但運筆行文卻也得以更為自由。

史書之目的在於徵實、實錄，不可憑空想像，內容必須有所依據，從而寫人敘事不易精采。小說《三國志演義》之受讀者喜愛嗜讀之程度遠遠勝過史書《三國志》，其原因便在於此。

（三）、宋元「說話」對於劉辰翁的影響不大

劉辰翁的批語多次出現「小說」一詞，從上文所引已有：「小說不厭」、「乃小說常情」、「亦似小說書袋子」、「小說多巧」、「小說取笑」等。究竟劉辰翁所謂的「小說」，義涵到底如何？也是一個必須探討的課題。

「小說」在中國是一個頗為含混的名稱，內容也從而包羅萬象。雖然早在先秦時期《莊子·外物》就已出現此一名稱，但是迄至清末，「小說」的內涵仍然龐雜不清。清人劉廷璣即表示：

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自漢、魏、晉、唐、宋、元、明以來，不下數百家，皆文辭典雅，有紀其各代之帝略官制，朝政宮幃，上而天文，下而輿土，人物歲時，禽魚花卉，邊塞外國，釋道神鬼，仙妖怪異，或合或分，或詳或略，或列傳，或行紀，或舉大綱，或陳瑣細，或短章數語，或連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備，統曰歷朝小說。¹¹³

所謂的「小說」，中國古代實有「子部小說」與「集部小說」的不同義涵，這兩類「小說」的性質差異頗大。而「子部小說」的觀念更深入人心，遠甚於「集部小說」，但大部分不能算是文學作品。它是指《漢書·藝文志》論述九流十家中那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小說家之言，偏重在議論與浮誇的記載，也正因為具有夾議夾敘的性質，所以宋元「說話」伎藝中有所謂「小說」一家。

《四庫全書》仍將「小說」列在子部，更把「子部小說」分成「敘述雜事」（如《西京雜記》等）、「記錄異聞」（《山海經》等）與「綴輯瑣語」（《博物志》等）三種，其功能只在於「寓勸誡、廣見聞、資考證」¹¹⁴，不出先秦以來的傳統概念。至於唐宋之後流通於民間的話本則被認為是「誣謾失真、妖妄熒聽」，遭到摒棄而不加

¹¹³ 清·劉廷璣：《在園雜誌》（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2，頁83。

¹¹⁴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40，子部小說家類一，頁2882。

以收錄。固然不得列入史部，甚至也不承認其為子部小說，然而以今人的觀念來看，這些才是真正的文學作品，實應當歸類在集部。

劉辰翁之使用「小說」一詞，乃是意指「子部小說類」之中那些虛構甚至荒唐不經的文言筆記。乃是先秦以來傳統的而且普遍使用的義涵，並不是特別用以指稱宋元「說話」伎藝中的「小說」一家或「話本（小說）」，相同的情況也存在於「說話」一詞的使用。

儘管唐代以來「話」有故事一義，「說話」即可謂「取此流傳之故事而敷衍說唱之」¹¹⁵，成為瓦肆中的講唱伎藝，但是「說話」一詞更普遍被使用的語義則是指平常的講話或者一套說詞。與劉辰翁生卒年代相近的戲曲家關漢卿（1210-1300？），其作品向以本色、俚俗與自然著稱，運用許多生動的口語，用以表現人物的身分與性格。僅就其名著《竇娥冤》一齣雜劇而言，「說話」一詞總共出現4次：

（竇天章）（做歎科，云：）「嗨！這箇那裡是做媳婦？分明是賣與他一般。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兩銀子，分外但得些少東西，勾[夠]小生應舉之費，便也過望了。說話之間，早來到他家門首。婆婆在家麼？」

（劊子云：）「你還有甚的說話，此時不對監斬大人說，幾時說那？」

（竇娥）（正旦再跪科，云：）「大人，我竇娥死的委實冤枉，從今以後，著這楚州亢旱三年。」（監斬官云：）「打嘴！那有這等說話！」

（監斬官云：）「這死罪必有冤枉。早兩樁兒應驗了，不知亢旱三年的說話，准[準]也不准[準]？且看後來如何。」¹¹⁶

這些「說話」一詞的意義都與「說話」伎藝無關，都只是平常的意思，沒有特殊的義涵。因此不宜太強調「說話」伎藝的影響力，甚至認為足以左右文人的閱讀與評點詩文的態度，這與實情不符。雖然民國以來，宋元話本等通俗文學受到了學界的重視，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但在宋元時代，一般士大夫卻大多鄙薄輕忽而不顧，這從流傳至今的筆記等文獻中罕有相關記載即可看出。魯迅論及「宋人之說話及其

¹¹⁵ 孫楷第：〈說話考〉，《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頁29。

¹¹⁶ 元·關漢卿：《竇娥冤雜劇》，收入楊家駱主編：《元人雜劇注》（臺北：世界書局，1997），楔子及第三折，頁4、31、32。

影響」時便指出：

因為當時一般士大夫，雖然都講理學，鄙視小說，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娛樂的；平民的小說之起來，正是無足怪訝的事。

南宋初年，這種話本還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國時，則雜劇消歇，話本也不通行了。¹¹⁷

「說話」伎藝畢竟是屬於民間的通俗娛樂，早期的話本文字鄙俚、思想庸俗，文人並不重視，所受到的影響當然也就非常有限，因此不應認定劉辰翁的評點具有「說話人」的口吻和眼光。批語受到書籍版式的限制，字句必然是片斷的，這與學者所認為的市民文學或城市美學無關。況且，此書「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¹¹⁸，終究與宋元話本的通俗性質差異甚大，不能等同而論。

十、結語

劉應登的批注《世說》，時間雖然早於劉辰翁，明代也早有凌瀛初等人將它視為評點¹¹⁹，但它終究屬於「校勘文字」、「訓釋詞語」、「疏通文意」¹²⁰的傳統箋注，不屬於文學批評性質的詮釋，因此難以把它視為小說評點。

劉辰翁既然善長寫作詩詞、古文，自然會從文學的角度評論作品的工拙，關注寫作技法的優劣得失。況且有備受稱譽的劉孝標之注疏在前，勢必要另闢蹊徑，改換不同的觀點。他批點《世說》之際，正當蒙元初期，異族統治，科舉停廢，文人地位低落。他的滿腹牢騷與憤悶，正可藉題發揮，以隨興而自由的筆觸來宣吐。這些都促使其能夠擺脫科舉的實用性，評人論事之筆墨清新，超越了名物、語詞、義理以及典故等傳統訓詁的條例與體式，以評詩論文的态度來評點《世說》。

¹¹⁷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國小說史略》，頁 333。

¹¹⁸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頁 62。

¹¹⁹ 明·凌瀛初四色套印本《世說新語跋》，收入劉強：《世說新語會評》，附錄，頁 531。

¹²⁰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頁 97。又見於康來新：《發跡變態：宋人小說學論稿》，頁 195。

劉辰翁雖然曾經生活於南宋城市，具有市民生活的經驗，但是除非有直接的資料佐證，否則吾人依據劉辰翁的生平、交游、學識、詩文創作與文學觀，都難以推論他本人受到「說話」伎藝的影響，左右了他的閱讀與評點詩文的方法和態度。況且南宋末年，異族侵擾不休，征戰不斷，社會動盪不安，城市經濟大受殘害，所謂繁榮的都市遊藝活動在南宋末期實已極為蕭條，從而「說話」伎藝的影響力更大不如前。

劉辰翁的評點《世說》確實已具有文學批評的性質，在簡短的評說中能夠聯繫到人物的神情、身分、性格和語言，參照現實生活的經驗以剖析事件發展的情理。這對於後世文人，包括小說作者與評點者，確實有其啟發性與示範的歷史意義，堪稱中國小說評點之祖。但其影響力，仍然遠不及宋代以來的詩話、古文評點選本，以及中國經學的章句注疏、史書論贊直接而深厚，是以我們也不宜過於高估他對於明清文人評點白話小說的影響力，否則何以必須在三百年之後，直到明代萬曆年間才能有第二部小說評點的產生。¹²¹

對於《世說》的評點，今人多讚賞其開創之功，但其批語中也存有一些充滿個人愛憎好惡、主觀情緒的用語，實際上無益於作品的欣賞與理解，這對於後世各類文本之評點，自然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¹²¹ 刊於萬曆 19 年（1591）的萬卷樓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大概是第二部小說評點。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頁 15。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宏業書局，1984。

南朝宋·劉義慶著，元·劉應登注，劉辰翁批：《世說新語》八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劉應登原刊、元坊肆增刊評語本）。

南朝宋·劉義慶著，元·劉應登注，劉辰翁批：《世說新語》八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元坊刊本）。

*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

南朝宋·劉義慶著，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1。

南朝宋·劉義慶著，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2000。

南朝宋·劉義慶著，朱鑄禹彙校集注：《世說新語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南朝宋·劉義慶著，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唐·李賀作，宋·劉辰翁評點，明·吳正子箋註：《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107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宋·倪思撰，劉辰翁評：《班馬異同評》，濟南：齊魯書社，1996。

宋·劉辰翁著，段大林校點：《劉辰翁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宋·劉辰翁：《莊子南華真經點校》，收入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

元·劉將孫：《養吾齋集》，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1199冊。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集部第1210冊。

元·關漢卿：《竇娥冤雜劇》，收入楊家駱主編：《元人雜劇注》，臺北：世界書局，1997。

明·陳繼儒：《晚香堂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明·許自昌：《樗齋漫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5》，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明·黃宗羲：《南雷文定》，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明·錢希言：《戲瑕》，收入《筆記小說大觀》17編，臺北：新興書局，1978。
- 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0。
-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清·曾國藩等修：《江西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659冊。
- 清·陳汝禎等修，匡汝諧等纂：《廬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劉廷璣：《在園雜誌》，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二、近人論著

- 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 王汝梅、張羽：《中國小說理論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 王利器：《王利器論學雜著》，臺北：貫雅文化公司，1992。
- 王欣夫：《文獻學講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 王叔岷：《斲齋學》，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
- *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 周大璞：《訓詁學》，臺北：洪葉文化公司，2000。
- 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孫琴安：〈劉辰翁的文學評點及其地位〉，《天府新論》6（1997），頁16-29。
-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 孫楷第：《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

- 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 陳美林：〈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簡論〉，《陰山學刊》13：1（2000.3），頁 21-32。
- 陳紅彥：《元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 陳謙豫：《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 康來新：《發跡變態：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 * 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臺北：里仁書局，2004。
- 焦印亭：《劉辰翁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 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 葉朗：《中國小說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87。
- *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國文學誌》3（1999.6），頁 199-248。
- 楊燕起等：《歷代名家評史記》，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90。
- 寧宗一：《中國小說學通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 寧宗一：〈小說評點與小說藝術〉，《尋根》4（2001），頁 37-48。
- 潘建國：〈凌濛初刊刻評點世說新語考述〉，《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3：5（2004.9），頁 27-38。
- 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係元代坊肆偽托〉，《文學遺產》6（2009），頁 65-77。
-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1999。
- 劉良明：《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
- 劉強：《世說新語會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 錢鍾書：《管錐篇》，北京：三聯書店，2008。
- *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蘭臺出版社，2001。
- 韓進廉：《中國小說美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
- 譚帆：〈小說評點的萌興〉，《文藝理論研究》6（1996），頁 23-35。
- *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 〔美〕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美〕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yan Jong-shu. *Guan Zhui Pian* (Pipe-Awl Chapters). Beijing: Beijing San-lien Books, 2008.
- Chyan Muh. *Zhong Guo Shi Xue Ming Zhu* (The Famous Work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aipei: Lan Tai Press, 2001.
- Liou Yih-ching (Song Dynasty). Yu Jia-shyi, annotated. *Shi Shuo Xin Yu Jian Shu* (An Annotated Edition of Shi Shuo Xin Yu). Taipei: Hua Zheng Book Shop, 1989.
- Lu Shiunn. *Zhong Guo Xiao Shuo Shi Lue*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99.
- Martin Wallace. *Dang Dai Xu Shi Xue* (The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Wu Sheau-ming, trans.).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ei Jia-ling. *Shi Shuo Xin Yu De Yu Yan Yu Xu Shi* (The Language and Narrative of Shi Shuo Xin Yu). Taipei: Le Jin Books, 2004.
- Tarn Farn. *Zhong Guo Xiao Shuo Ping Dian Yan Jiu* (The Study of the Commentary on Chinese Novel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ang Neng-shiann. *Shi Shuo Xin Yu Yan Jiu* (The Study of Shi Shuo Xin Yu). Nanjing: Jiang Su Gu Ji Press, 1992.
- Yeh Lang. *Zhong Guo Xiao Shuo Mei Xue*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Fiction). Taipei: Le Jin Books, 1987.
- Yang Yu-cheng. "Liou Chen-weng: Yue Du Zhuan Jia" (Liou Chen-weng: A Reading Specialist). *Chinese Studies* 3 (1999: 199-248).

